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 四 卷

上 册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1914—1931

〔英〕G.D.H.柯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上册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1914—1931

〔英〕G. D. H. 柯尔 著

宋 宁 周叶谦

李鹏远 李梅彬 等译

郭 健 校

商务印书馆

1990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v, Part I

COMMU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1914—1931

By C.D.H. COLE

LONDON, MACMILLAN, 1958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 1958 年版译出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上册

[英] G.D.H. 柯尔 著

宋宁 周叶谦

李梅彬 等译

郭健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68-2/D·53

---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34 千

印数 0-2 100 册

印张 14

定价: 4.95 元

## 前 言

在撰写本卷过程中,许多朋友给了我慷慨的帮助,对此我必须再一次表示感谢。H. N. 布雷斯福德先生、教授艾赛亚·伯林爵士和朱利叶斯·布朗撒尔先生这三人的意见,我十分尊重;他们阅读了全稿,并加以指点,使我得以根据所提各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我对他们三位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另一些人对某些篇章所给予的帮助,特别是增补原来所缺的生卒日期。因为我认为,知悉书中人物做出一切值得论述的事情时的年龄,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给我帮助的有:法国社会史研究所的 M. J. 梅特隆先生,以及 M. 莫里斯·多曼热先生(法国部分);格哈德·格莱斯贝格博士和吕特·格莱斯贝格夫人(德国部分);劳埃德·罗斯先生(澳大利亚部分);J. P. L. 维辛博士(荷兰部分);勒内·勒纳尔先生(比利时部分);布兰科·普里比切维奇先生(南斯拉夫部分);S. K. 埃万耶利泽斯先生(希腊部分);鲇泽岩雄教授(日本部分);路易斯·恩里克斯先生(智利部分);马克·斯塔尔先生(美国部分);卡洛斯·埃查奎先生(阿根廷部分);阿尔泰罗·瓦尔蒂亚先生(芬兰部分);J. W. 阿默斯先生(瑞典部分);H. K. 莱姆库尔先生(挪威部分);唐·费利佩·德布斯塔曼特博士(秘鲁部分);G. 卢德尔斯·德内格里先生(墨西哥部分);夏尔·巴比埃先生(瑞士部分);卡洛·多利奥博士(意大利部分);约翰·高兰先生(关于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自由出版社的 V. 理查兹先生(关于无政府主义者);阿图尔·莱宁先生(关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我还需向 Z. 纳伊德尔先生致谢。他通读了本卷有关波兰的一

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使我在许多方面作了修改。

- vi 如果我的生命允许的话,我将为本书再写一卷,记载的史料至少要等到1945年,或许更近一些。我回顾起来感到,如果我现在写第一卷,许多地方的写法将会大不相同;但我认为,主要之点无须作实质性的修改。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每一个问题或大多数问题都叙述得正确;而是认为,我不可能对已写的内容再做什么实质性的改进。虽然有那么多朋友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但书中的一切见解当然完全是我自己的,而不得归之于那些曾经给我以最有益的帮助的人们。

G. D. H. 柯尔

1957年12月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第一章 导言.....                                | 1   |
| 第二章 三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和斯德<br>哥尔摩.....       | 26  |
| 第三章 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                      | 59  |
| 第四章 战时的德国(1914—1918年).....                 | 98  |
| 第五章 1918—1921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 127 |
| 第六章 1917—1921年俄国的革命和内战.....                | 165 |
| 第七章 奥匈帝国的革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br>伐克.....        | 205 |
| 第八章 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br>希腊.....       | 248 |
| 第九章 两个对立的国际(1919—1921年).....               | 276 |
| 第十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殖<br>民主义、和平与裁军..... | 327 |
| 第十一章 法西斯在意大利获胜.....                        | 350 |
| 第十二章 从1914年到总罢工之间的英国.....                  | 386 |
| 附：主要人物表.....                               | 435 |

# 第 一 章

1

## 导 言

本卷——《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所论述的时期比以前各卷均短，只有18年，而第1卷为60年，第2卷为40年，第3卷为25年。我原拟将1914至1939年间的历史写成一卷；但经过考虑之后，认为最好不将一个性质不同的新时代包括在内，这个新时代以1931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为开端，而以两年后纳粹在德国掌权为其在政治上的形成。我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因是：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看，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争取全世界工人效忠的斗争；在以后的十年中，虽然这场斗争仍在继续，甚至蔓延到更广大的地区，但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对民主主义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挑战已比它占据更主要的地位，而且失业到处出现，农产品价格暴跌，罗斯福在美国实行的“新政”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新阐述所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理论的改变，也使这场斗争受到巨大的影响。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在一卷书中对这两个时期作出令人满意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内容太多不能压缩成一卷的篇幅，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所涉及和注意的中心问题大不相同，无法象我一直寻求的那样统一成一个整体。

实际上，由战争引起的以俄国革命为主要焦点的世界性动荡和混乱，以及企图把俄国的动乱变成世界革命的做法所遭受的打2击，已为专门研究从1914年到1931年经济崩溃这一时期的情况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当然，也不可能把叙述的内容完全局限于这些年

的发展。对某些情况，我的论述超越了这个界限，因为就某个国家的事态来讲，1931年似乎不宜作为截止期。而至少在一个情况，即苏联的情况下，我是提前结束的，以免把关于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的论述在最不适当的阶段割断。但一般来说，我叙述到大萧条第一次袭来之时，对三十年代的发展则不包括在内，因为这时每个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问题——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最终仍然坚持同以前几乎一样的主张。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中心问题必然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单纯是它的发生，而且还包括它在整个外国干涉和内战时期，以及在列宁于1921年开始采取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如何得以存在下来并获得发展的。不管人们对俄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或者对其在思想和行动领域的影响抱怎样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俄国革命已证明——不管是好是坏，或者也好也坏——它是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事实上比那次大动乱意义还深远，因为它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并且使整个人类陷入大动荡之中。即使在社会主义者当中，对它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它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榜样，使社会上各种旧形式的矛盾必然会得到克服；而另外一些人则用毫不掩饰的词句谴责它是人压迫人的一切暴政中最恐怖的一种，而且尽管他们也许是社会主义者，但已准备与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这种暴政，并鼓动在苏维埃统治下的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起来推翻它。诚然，在本卷所论述的时期当中，这种尖锐的分歧总的说来并不象过去10年间那样明显，但即使，从一开始，或至少是从1919年以来，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就表现为尖锐对立的社会哲学和行动纲领，这样一来，如果把实际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说成是，或者看成是在一个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哪怕是松散联合起来的——力量，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并不是说，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更

不用说整个工人运动——已分裂成截然不同互相对垒的两派，各自都认为与对方毫无共同之处。事实远非如此。工人阶级对俄国革命的同情，在那些反对共产主义学说和反对号召效仿俄国榜样的广大群众中，仍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即使是那些最热衷于谴责共产党独裁和赞扬议会民主原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领导人，也大都审慎地不承认对新俄国抱有敌对情绪，并敦促本国政府不要对之采取敌对行动。这也并非出自他们的伪善。他们不能不对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感到高兴，并对俄国人建立新社会的斗争感到强烈的同情，尽管他们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些不仅认为自己必须采取，同时尽可能诱劝其他各国工人也采取的许多做法。

此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支持者既不同意布尔什维克鼓吹按照俄国模式进行世界革命，也不同意那些彻头彻尾的议会改良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说得一无是处。在这些采取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愿意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做法虽然不适用于较先进的西方社会的条件，但可能是在俄国实际可取的唯一办法——伟大的俄国革命只有这样才能抵御许多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至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管思想上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样的怀疑，都准备搁置一边，并注视着苏联的伟大实验怎样发展，殷切希望这种实验哪怕是经过长时期以后会导致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出现；在这个社会中，一般人都能在公有制和按照自己的意志有计划地管理生产力这样的体制下决定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观察者总是热心于尽量从最好处设想他们相信将在苏联内部发生的事情。他们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最初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当生存看来最终已完全有保证的时候，他们又为俄国人在工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欢

欣鼓舞，以之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缓慢得多的生产发展相比较。他们也为在民众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而受到巨大的鼓舞；他们当中许多人访问苏联归来后，对于让他们看到的大力从事的大规模社会和经济建设工程印象很深。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共产党骨干分子强烈的献身精神甚至更为感动，回国后将一个明确自身的目标并认识到必须全力以赴实现这些目标的有纪律的党所取得的成就，同西方社会民主党内组织涣散现象和普遍存在的消极态度作对比。悉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二人的巨著《苏联的共产主义：新的文明？》（书名中的“？”在后来的版本中删去了）就是这种反应的突出例子，而由于它出自第一流的费边主义理论家之手，就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费边主义本是社会民主主义披着最富有渐进论和进化论色彩的外衣的哲学。

的确，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人当中，存在着某种内疚的感觉，因为被认为非常落后的俄国人已经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都推翻，代之以一种社会主义；而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虽比战前强大得多，但在大多数国家，取得政权却仍遥遥无期。对于克服重重障碍不顾一切地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人们加以非  
5 难，差不多等于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在这个时期——我指的是二十年代——只有少数人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正是要建立这样的生活方式。许多人都认为，在苏联存在着的专政和一党制政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一旦新社会巩固后，即将加以取消；随着反革命的危險日趋减少，苏维埃制度的日益自由化必将出现无疑。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承认有节制的私人企业和废除农产品征收政策后，这样的希望大大受到鼓舞；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党的日益官僚主义化所提出的警告，没有被大多数的外界观察家认真对待——而由于托洛茨基本人也主张实行严厉对待农民、加紧工业化，甚至把红军当作被招募的劳动力来使用的政策，上述警

告就越发不被观察家们所认真对待。直到俄国领导人把注意力转向加速农业集体化和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而加以消灭时，严重的忧虑才开始产生，认为整个趋势看来不是走向自由化，而是背道而驰；即使这样的事态发展面前，西方的看法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许多西方的社会党人把很高的希望寄托在集体化和改进农业设备以提高产量并促使耕作方法的现代化上，而对随着消灭富农而采取的残酷手段直到后来才为人们普遍了解。

必须牢记的是：在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期，苏联经济的突出特点似乎是在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方面，以及在克服内战时期各方面的严重匮乏方面获得的惊人成就；而苏维埃政治制度的那种不容不同意见存在的特点还远没有象后来，即开展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而一反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做法，特别是对所谓的“叛徒”和“破坏分子”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审判时那样昭然若揭。即使当这些方面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后，许多观察家仍然误以为1936年的苏联新宪法规定了实行普遍选举权和表面上的自由选举是朝着广泛民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从而被引入了歧途。此外，在纳粹取得胜利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实际变化也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看不清它的内部情况。在三十年代中期，苏联确实在寻求一条结成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道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也正在设法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阵线”，在同工人阶级其他分子的关系上采取和以前相反的策略。这些步骤虽然遭到除法国和一个时期西班牙之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反对，但却使西方的许多社会党人对于他们强烈不满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不过，在二十年代，虽然互相对立的两个“国际”一再进行“专政对民主”的斗争，但许多强烈反对共产国际的分裂策略、并对共产国际不断攻击右派以至中派的做法十分不满的人们，在思想上

却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苏联显然能够支配，而且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也确实支配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行动。季诺维也夫及其在共产国际中的同伙，被广泛认为是到处煽风点火的人，而与掌握苏联官方政策的那些比较谨慎的人不同。在原指望出现的世界革命的前景化为泡影后，苏联的政策看来已越来越集中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上。这种分歧是确实存在的，但在二十年代，与其说在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之间有什么冲突的话，不如说双方在活动范围的划分上意见还是一致的。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失败和德国共产党人的垮台，尤其是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决裂使共产国际的亚洲革命计划破产之后，共产国际就暂时停止直接推动世界革命，而成为以保卫苏联利益为主要目标的一个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机构，等待所盼望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指望它使世界革命再一次成为可以立即实现的目标。路线上的这种变更，实际上完全是由于一些重大事件的压力而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如此的；它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该组织以及参加该组织的各党更加听命于俄国的控制，更加肯定地成为俄国人为增加苏联防卫力量而使用的工具。但即使在当时，连这一点也并不象后来那样明显。

我承认，在二十年代，我本人对于苏联的极权主义倾向的力量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也和别人一样相信，当苏联的经济走上正规，能够使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之后，趋势将会是愈来愈自由化。与一些从事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的朋友和同事不同，我从来不向往成为共产党人，因为我的主张基本上属于多元论和自由意志论，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哲学思想是以死板的决定论原理为基础，并且不考虑时间和地点，而肯定它那一整套统一的理论具有毫无疑问的阶级正确性，这与我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我相信而且将一直相信，自由的主要

基础是选择的自由。任何“好的”社会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允许并促进这种自由；在它的内部有各种各样的自治机构，每个机构可在各机构组织起来的灵活的总结构范围内，自由制订自己的政策，各机构间可以表示真正的不同意见，并通过公开讨论求得解决。这种主张与威廉·莫里斯或皮·约·蒲鲁东甚至克鲁泡特金的主张相类似，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同于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就必然使我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比他们的大多数人的实际表现理智得多，也仍然如此。但是虽然如此，即使我对于共产党人信奉这种不容许不同意见存在的那说的程度的认识，比我实际上的认识更加充分，我也不认为我关于非共产党 8 的社会主义者应对苏联抱什么正当态度的看法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在我看来，所有社会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依然是团结起来援助苏联，不仅反对那些仍然希望苏联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将其推翻的敌人，而且反对那些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建立一道封锁线来阻挡苏联影响的人。我过去和今天都相信，1917年的俄国革命，包括其布尔什维克阶段，不仅是世界史上一个突出事件，而且总的说来是一个有益的事件，因为它给世界各民族中人数众多的一部分人尤其是给那些遭受最残酷压迫与极端贫苦和受不到教育的人们，指出了摆脱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共产主义也许对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赢得了真实的民主自由和经济、社会、教育方面的巨大成果。但在我看来，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它仍然具有明确的启示，不过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不愿意有效地加以传播，甚至不愿意正确加以评价。

即使在这一阶段，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所有和他们意见不同或拒不承认他们的意志就是法令的人们时的残酷无情，确实引起我的反感。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似乎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阶级敌人”根本无人权可言，对他们可以杀掉或加以虐待而无须感到内疚，而且，究竟谁是“阶级敌人”，是可以理所当然地加在任何人头上的，包括任何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社会党人在内。我并不是说在1917年或1918年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最初阶段，我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态度，不过后来我体会到，这种态度一直存在着，并成为共产党人行动哲学的一个肯定无疑的部分。我想，只是在1919到1920年俄国内战期间，我才认识到这种态度，当时我

9 倾向于认为这是伴随战争而来的几乎不可避免的产物，预料在内战过去后，很快就会结束。1921年初喀琅施塔得叛乱发生时，第一次出现了以社会主义者屠杀社会主义者作为布尔什维克为巩固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公开组成部分，这在我思想上激起极大震动。但在那个时期，残酷无情地对待喀琅施塔得兵变者，恰好也正值实行新经济政策之时，而这似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趋势；我同其他许多社会党人一样，对喀琅施塔得发生的事件仅有模糊的了解，至少半信半疑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过错，把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变本加厉的迫害，解释为内战情况下的产物，并不认为它是为消灭一切可能产生持不同意见的领导集团的来源而蓄意制订的政策。列宁主义否定任何道德准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关系或态度如何，对这一点的全部含义，我简直不理解，而错误地认为那些我决不能赞同的暴行，是沙皇制度残酷统治的遗传物，由于处在半饥饿和内战的严重情况而更形加剧，一旦革命度过最危急阶段，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就会立即放弃这种态度。现在我明白，对此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这种残酷无情的做法与抵制所谓“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乃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比起今天来，在紧接着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是很不容易理解这一点的，人们很容易低估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现象，认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在政治和社会行为方面缺乏

文明的或宽容的传统的国家，这主要是革命和内战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

因此，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的看法也与共产党人迥然不同，但我同时对“伯尔尼国际”及其前身、1923年在汉堡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宣扬的社会民主主义信条也持严格的批评态度。在我看来，这两个国际所宣扬的议会渐进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原理变得十分狭隘，似乎它只能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国家，即它们业已经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程，并已习惯于用西方议会的方法来进行治理。与此相反，我过去和现在都坚持一种十分广义的社会主义概念，足以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要求它们必须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统治的全过程，或者必须达到接受近似西欧或美国的议会体制的程度。我认为，并不是只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国人民都必须依次循之前进；而且各国人民必定要进入的社会主义，在国与国之间也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即不是仿效苏联的模式，就是仿效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老实说，我实际上对政治体制并不象对经济和社会体制那样感兴趣，认为人类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的环境，对他们的幸福与自由来说，要比对他们行使政府当局最高权力的庞大的政治结构更加重要。总之，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属于又一种人，不是模棱两可介于两者之间，而是同这两者根本不同。

我深知，基尔特社会主义，即使在它的影响的极盛时期，根本谈不上是一种被人们广泛信奉的社会主义信条。它基本上仍然是英国的一个流派，虽然在其他许多国家有与它相类似的表现：例如法国的“工业化的国有化”运动；巴勒斯坦的犹太工人总联盟的活动；美国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普卢姆计划”；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张；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俄国本身——关

于工人参加工业管理的许许多多计划。但是，它没有强大到足以经受住随着战后的经济萧条而来的工会的失败，也未能作为第三党而有力地介入敌对的“国际”之间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它只能是一度以“第二半”国际即“维也纳国际”为代表的“中派”势力的颇不得力的盟友，而“维也纳国际”没有多久也就被两个极端派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所摧毁了。

- “维也纳国际”建立的基础，实际上是承认，并没有一条唯一的
- 11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能真正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千差万别的情况。成立这个国际是企图说服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需要采取种种不同的斗争方式，并且停止对他们的分歧进行争论，而是重新建立一个共同的国际，他们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下继续生活在一起，而不管追求这种共同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千差万别。这个在适应战后时期情况的新基础上恢复以前第二国际的计划，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成功的希望。分歧太严重，不仅在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中间有分歧，他们所激起的各种情绪更加势不两立。共产党人谴责反对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叛徒”；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认为议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专政”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两派不可能在一个组织内共同工作，不管这个组织是多么松散。有些人毫不妥协地主张“国际”应由集中的权力加以控制，在“国际”中，各国的党只不过是附属的地方组织，有些人则要求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权根据当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选区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政策，这两种人之间也不可能进行合作。维也纳国际所主张的组织上的团结虽然是一种幻想，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许多国家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深切感到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人阶级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既不赞同共产主义，也不赞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那种包罗万象的议会主义。中派之所以失败，正如我希望在

本卷中加以说明的并非由于中派的人数不多，而是由于不管他们的人数有多少，个人品质如何，他们都不可能在共产国际和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之间形成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因为共产国际有苏联的实力和威望作后盾，而第二国际则可以依靠西方世界先进国家社会主义多数派中那些鼓吹议会制的人们的支持。

读者在本卷中会清楚地看到，在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 12 的斗争中，我是同情中派的，不过我对他们认为有实际可能重新建立一个为敌对各派所能接受的国际这样的信念，从来也没有赞同过。当团结的幻想破灭之后，维也纳国际决定并入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我不怀疑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尽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显然是为了确保右翼议会主义者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其他路线可循。与共产国际联合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因为“二十一条”所体现该组织的态度，毫无妥协可言。而依附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则有可能在加入它的各党范围内实行比较有调和余地的改良主义政策。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比起它所代替的伯尔尼国际来，确实是一个教条主义色彩较轻的右翼组织，尽管在任何重要的方面这一点并不十分明显。意大利社会党人在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后，只剩下流亡者组成的一些小团体，法国社会党则由于共产党的兴起而变得软弱无力，这样，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必然为德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所控制，西方一些较小国家——奥地利、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党人虽亦起重要作用，但居于次要地位。挪威社会党人在同共产国际最终决裂后，一度对它采取观望态度，在 1938 年方才与它发生联系。在美国，美国社会党已濒于分裂；在美洲大陆其他地方，只存在一些小的多半不起作用的社会主义派别。澳大利亚工党和新西兰工党，态度一直冷淡；在亚洲和非洲，社会党不同于那些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多半是存在不久的小团体，除在南非外几乎还没有开始形成，而在南非，“纯粹白人”